

耿耿难眠

柯云路 雪珂





2 035 7971 5

耿耿难眠

柯云路 雪 珂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耿耿难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1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插页 2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6,000

书号 10019·3616

定价 0.57 元

目 录

三千万	(1)
他的力量来自哪儿?	(52)
棉花厂长	(67)
耿耿难眠	(86)

三 千 万

一

一九七九年初，未竣工的维尼纶厂。

厂房之间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钢筋、木料；凛冽的寒风中，水泥袋的碎纸片漫天飞舞。维尼纶厂建厂指挥部的成员们正在陪同省轻工局的几位领导视察着工地。

“三千万，一个子儿也压缩不下去了？成了钢性的了？”说这话的是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他那扫视着众人的似乎是狡黠的目光里隐隐含着审视，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额上的皱纹特别深，脸上的线条象岩石裂缝般粗犷刚劲。他以惯有的诙谐口气说着，明显地流露出一不满。

这位刚刚官复原职的丁局长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文化革命”前，他以果断执着在全省闻名，曾有过许多美传。这次他到维尼纶厂是来审查追加预算的。维尼纶厂是个建设十年还未竣工的“胡子工程”了！今年，总算提出了一年竣工的计划。但建厂联合指挥部——这是由维尼纶厂（通称甲方）和负责施工的省建公司九处（通称乙方）联合组成——却又同时提出了一个需要追加投资三千万元的申请

报告。要知道，维尼纶厂从最初的总概算五千万元，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超支而追加投资，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了！一个总概算才五千万元的项目，要花三千万元来扫尾竣工，无论如何是太不象话了！他知道，压缩投资是当今最难的事情。连计委、建委、国家都没办法，人人都说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状！但他就是要在这上头试一试，冲一冲这个谁也不敢碰的“现状”！他觉得，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维尼纶厂的党委书记、联合指挥部的总指挥张安邦是他六五年亲自在一个纺织厂培养和提拔的干部。他了解他，相信他会配合这次审查工作的。

但是，事情并不象他预料的那样。十多年没接触，张安邦变得陌生、不可捉摸了。虽然他表面上对老上级显出一种特有的亲热、坦然，但是在客气、尊敬中，总好象隔着层什么东西。在张安邦的安排下，几天来对追加预算的审查，也好象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云雾。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很精确，丝毫看不出漫天要价的迹象。要账目，有棵两尺高的“预算书”、“计算书”送来，数以千页的表格里填满了用计算机算出来的数万个数字；要听取意见，指挥部甲乙两方都作了详细汇报；好象三千万元无可非议，只有拍板了！可是，敷衍的客套，官样的文章，却使丁猛愈来愈愤懑！他始终感到有人张开了一张网，罩住了一切，使他根本看不到实情！是谁张的网呢？张安邦？丁猛还不能断定。

“我们已经是一压再压，没有一点弹性了！”一摊双手答话的正是张安邦。这位厂党委书记有着一张长圆的胖脸，光

润润的，没有皱折，没有棱角，象团揉光的白面，眉毛细淡，眼睛漂亮而有神。他的嗓门，即使是这样随便说话也十分洪亮。话语里，带有一种对老上级才有的亲近和诉苦的口吻。他说完又笑了笑，很亲切地看了看左右。簇拥着他的部下们用迎合的点头和微笑呼应着。

“这是什么？”丁猛指着一座象是临时搭的烂仓库模样的建筑问。

“这是临时食堂。”张安邦从容地回答。他指着旁边被水泥、机器堆满大厅的原来的食堂说：“正式食堂做了临时仓库——因为仓库不够用——所以又盖个临时食堂，职工吃饭总不能露天。”说着他们已经走入了“临时食堂”的大厅，仰面是席片的棚顶，低头是烂砖的地面，墙上窗户没框，横七竖八的木条钉住的塑料薄膜被风刮得呼塌塌作响，确实是一副“临时”样。轻工局基建处的一位处长点头证实道：“盖临时食堂，他们有过申请报告。”

丁猛打量了一圈大厅，哼了一声说：“好一个临时食堂！……临时设施，为什么搞水泥砂浆砌墙？为什么还搞圈梁？……怕以后拆除起来太方便？嗯——？”丁猛上上下下指划着，两眼冒火地说，“这样大的面积，大门大窗的设计，看，这儿，连以后隔墙的基础都搞好了！这是临时食堂？……这是个大型俱乐部！变一下就成了！……搞假预算，搞计划外项目！犯法！”

人群中一片寂静和窘怩，大家都被意外的质问震慑住了。谁也没想到丁局长这样内行。问题严重了！

张安邦略含不满地扫视了一下大家，转向丁猛，坦然地笑了笑，颇有些感叹地说：“没办法啊，丁局长！这都是前几年的极左路线逼出来的！什么‘先生产，后生活’！谁敢公开搞个俱乐部啊！哪儿也不会批！……厂里尽是年轻工人，总应该关心职工文化生活！”张安邦委婉而理直气壮的解释，顿时扭转了气氛。大家都舒了口气，暗暗佩服自己的总指挥。现在，看来是轮到丁猛进退两难，不好回答了！

“你还是有功罗？”丁猛看着张安邦讽刺道，“现在是七九年了，知道吗？……为什么还弄虚作假？”看到张安邦还要张嘴解释什么，他一伸手打断说：

“你先写个检查——搞假临时食堂——准备接受处理！”

大家全怔住了！

“……然后，再打个报告——申请盖俱乐部，送局里批。”

这样的两条决定，象云烟中划过一道闪电，人们知晓了这位丁局长的份量！

“总指挥没有是非原则！……其他同志呢？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揭发、反映问题？”丁猛批评、质问的目光扫视着指挥部的成员们。没有一个人吭声。一堵沉默的墙！在伸手向国家多要钱上，在“为集体的利益”这面旗帜下，一个企业的干部往往是团结一致。合情又合理，谁也犯不着触犯众利，谁也在里面多少有一份，谁也要在本单位站住脚。这是现在很普遍的现状。这个现状几天来嘲弄和激怒着丁

猛。现在，人们都在他的目光下垂着眼。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维尼纶厂基建安装办公室主任白莎，这位中年女技术员只是掠了一下额头从蓝色围巾下露出一绺短发，很快地睨了一眼丁猛，照旧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别处。

“白莎同志，你负责搞预算，怎么也不坚持原则呢？”丁猛的目光移向她，直率地批评道。白莎苍白清秀的脸上，一下子泛起了愠怒的红晕，眼里射出冷冷的敌意。

“丁局长，这事情完全应该我负责。”张安邦站出来说话了，态度十分诚恳，“同志们都是辛辛苦苦做具体工作的。这几年，都很不容易！错误，完全在我。确实不能怪同志们。临时食堂这件事，和三千万也没关系……”

“没关系？你负责？等着吧，有你的责任负！”丁猛斜睨了一眼张安邦，心里说。张安邦在“临时食堂”上玩的花样，更使丁猛断定三千万有问题！他又看着白莎问：“白莎，你对三千万的最后意见呢？”

“三千万，这确实是维尼纶厂竣工最起码的数字了！——这意见我们都是是一致的！”张安邦接过话头，以老下级的身份带笑说，他极力想缓和一下气氛。

“这个安邦真是怪了！”丁猛严厉而不满地瞪了他一眼，“怎么就一言堂了呢！白莎的脑袋不在她肩上？”

张安邦笑了笑，一副甘愿接受丁猛任何批评的表情。

“白莎，谈你的最后意见吧，可不能光当头头儿的附庸！”丁猛说。

“当附庸？我还没学过！”白莎带着刺，冷冷地答道。丁

猛的话刺伤了她的自尊心。这位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女技术员，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在她眼里，任何事情上的认真都是没必要的：只要不触及她，三千万就三千万吧！她参与了预算编制，但从来都觉得与她无关。她不过是在厂里顺潮流而动，干她的八小时而已。

“白莎，你态度冷静一些，”张安邦爱护地责备道，“丁局长是让你谈对三千万的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白莎依然冷着脸，“三千万大概够了。吧！”她看也不看丁猛，甩了一下围巾，扭过身去，不说话了。

“大概？这是搞经济工作的人说的话？”丁猛冒火了，目光象剑一样在人群中扫动着，连腮帮子都搐动起来。人群却仍然只有沉默。面对沉默的人群，丁猛发觉自己应该冷静，发火——那不过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要打破罩住实情的这张网！他顿时想到了那个难得的人物，他睥睨了一眼张安邦，威严地说：

“既然如此，我要请个专家来查你们！……钱——维——丛——听说过吗？”

白莎不禁转过头，眼睛里闪过一瞬的惊讶。

张安邦没料到丁猛还要来这么一下，他爽朗地点了点头：“那当然好！那就更可靠了！”脸上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他不知道钱维丛是什么人。他相信，就是再内行的人，也难从浩如烟海的数字中，几天内看出问题来。

“你们最好是自己先减码！……查住了，可要当心！”丁猛说。

当天下午，白莎来到张安邦家。

“预算该重做就重做吧！……钱工程师来，这些账可经不住他查！”她很淡然地说道。

“哪有那么严重！”张安邦毫不在乎地笑着摇了摇头。中午，他已摸清了：钱维丛是轻工局一个搞设计的普通工程师，他的儿子，叫钱小博，就在维尼纶厂当工人。

“信不信吧！他过去是全国有名的预算专家！”

可张安邦既不知道钱维丛是预算专家，也不知道所谓预算专家有多大份量。为了掩饰自己的疑惑，他反而很有气派地哈哈一笑，用惯常对部下的和蔼的玩笑口吻说：“害怕罗？为工作，怕什么！”

“我怕什么！”白莎恼了，眼睛射出尖刻的目光，“我只觉得犯不着出事，没必要！”说完，一扭身走了。

看着白莎苗条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张安邦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马上采取对策！……但是，他却坐在沙发上恍惚了几秒钟。他一刹那又想起上午视察完工地后，丁猛对自己个别谈话中的批评，是那样的中肯，那样的坦率，使张安邦真有些感动。当时，在丁猛既严肃又和蔼的目光下，他也曾对“三千万”产生过犹豫……

这时，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是物资局来催问招工指标的。张安邦曾答应帮助弄几个招工指标，把物资局几位

局长的子女安排到省建公司——而这又是和“三千万”有关的。物资局里的人出的气都是粗的，张安邦一连答应了几个“行！”一个电话，使他立刻看清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看到了“三千万”后面隐现的许多局长、部长们的脸。电话一挂，他就恢复了毫不含糊的决心——

他必须弄到“三千万”！

虽然，他绝不会把其中哪怕一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他却必须把这“三千万”搞到手。否则，他在现实生活中会根本站不住脚的！就说在厂里，那些副书记、副厂长们要住一家一院的高标准平房；行政科科长要盖一个由他支配的高级招待所；医院院长要让厂医院楼再加高一层，为的是要更宽敞舒适的院长办公室……这各种各样的人物，在维尼纶厂领导权的巩固过程中都给他上下出过力，他们的要求都得给予满足。这一点就足以迫使他去争取“三千万”，而绝不能有失众望，造成众叛亲离！更广泛些说，一个钱多、物资多、汽车多、关系多的大厂书记，加上足够的权谋机智，在社会上就有许多无形的权力。而这无形的权力，对于爱财的，可以使家里沙发、电视机、电冰箱应有尽有；对于他这样爱权的，则有了向上进取的坚实基础。当然，他也并不是天生爱权的。“文化革命”一开始，他这个只当过一年副厂长的“当权派”也住过几天“牛棚”。那时，他最后悔的是自己为什么当了副厂长。但是，经过一番表态、站队、反戈一击，他也投入了急风暴雨。很快，他领悟了“政治”的奥妙，看到了“政治”的天地。在急流漩涡中几经沉浮，他埋葬了一个灵

魂，又膨胀了另一个灵魂，他终于被造就了！他虽然在十几年政治生活中饱尝了甜头和辛酸，不那么急于求成了，但还保持着政治上锲而不舍的意志。目前这个“三千万”，在厂内、厂外包含着他和许多方面利益的结合。远的不说，在预算中不给省建公司算得宽点，就搞不到招工指标，那么物资局头头们的子女就没法安排。而不这样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他又怎么能日益扩大自己的社会联系呢？他还想到了从物资上控制周围几个县，想到了把家属在厂里工作的那些地委领导干部们都请到厂里来住高标准的平房。总之，他深知这些年来当官“诀窍”：不把广泛的社会关系搞好，是无法进取的！现在是关系错综复杂的年头，不一定是顶头上司，也许是哪一个不被注意的小人物，往某一条线上递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升降。在维尼纶厂，一切和上层有联系的干部、工人，他都要摸底。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调看档案。哪怕你是个学徒工，只要你的父母或者三姑六舅九姨子中有一个硬牌人物，就一定要弄清、记住，在需要的时候，用适当的“照顾”，把你，因而也把你的“背景”织入他的网中。现在，他就要用这张网来争取“三千万”了！

下班前，他给钱维丛的儿子所在车间打了电话，让他们通知钱小博晚上来他家里；他告诉车间，最近不要分派钱小博在班上的工作了，厂党委另有任务交给他。

三

丁猛已经感受到了张安邦活动的包围。厂里的一些负责人和自己接触时无不从各个不同角度三言两语地讲讲“三千万”的必要。几个老乡、一个侄子——都是维尼纶厂的干部、工人——先后来厂临时招待所看他。他们的话语后面，似乎都有张安邦的长圆脸在隐隐出现。这样的包围越多，丁猛越气愤；而越气愤，则越冷静。当在地委工作的几位老相识和省里的一两个老上级也用看望、捎话来表示对“三千万”的关心时，丁猛深深感到张安邦这个人物有些非同小可了！他远不是自己在十几年前所赏识的那个张安邦了。那时他三十多岁，年轻、正直、敢坚持原则，有工作魄力，虽然有些骄傲的缺点，但愿意改正，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但现在，竟然变成这个样子。真是“时势造英雄”！丁猛一点不客气，他警告张安邦：“不要搞小动作！抓住了，当心吃家伙！”张安邦对此只是不加解释地笑一笑，那表情好象是说：我对你丁局长哪能搞小动作呢！丁猛也知道，这时的张安邦，对他进行任何言词的敲打，都是无济于事的，他都可以一笑敷衍。现在要的是尽快查清“三千万”！丁猛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工程师钱维丛。这是他上任第一天就发现的人才。当他在轻工局一个科室的晦暗角落，找到这位正弓背俯身于绘图板上的老工程师时，他几乎抑制不住一种愤懑的情绪。钱维丛！丁猛十几年前就看过他的

预算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位预算专家竟然被从国家建委“下放”到这儿，默默无闻，丢开专业改行九年了。

终于，钱维丛来到维尼纶厂。

当钱维丛从吉普车里钻出来时，出现在指挥部成员面前的只是一个略显驼背的身材矮小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头。“这就是钱工。”丁猛按轻工局内对钱维丛的惯称介绍道。他的样子毫不起眼，甚至有些衰颓，说话时有些客气得过分，握手时头也点得过多过低。这第一面，就让张安邦小看：寒酸！钱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地下降了。不过，张安邦既善于用不卑不亢的亲敬坦然对待上级领导，也善于用平易近人的微笑来表现对弱者的和蔼。他略挺起肚子，很有气派地伸出手和钱工相握。他微笑着，风趣地寒暄了几句，又转身一一介绍了指挥部的成员们，显出一个有威信的领导着足够的风度。

丁猛当然把来人当成圣驾。他知道这位专家一眼就能估出一座楼房的造价。当天晚上，在厂招待所房间里和钱工面对面坐着，丁猛就开门见山地说：“钱维丛挂帅！——‘三千万’的审查主要靠你罗！”“不，不，要靠领导。”钱工连忙说。“领导高明论？没了群众，左眼睛；没了专家，右眼睛！双眼睛的领导，管屁用！”丁猛说。看到钱工还要申辩，他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然后，从抽屉里端出一摞“预算书”，往桌上一放：“阿拉伯数字都在里头。要听汇报，我给你组织；要看现场，让指挥部派人陪你。你拍板，我负责，这就是咱俩的双簧！嗯？要几天时间够了？——吃饭，

我给你从食堂打。”丁猛把审查“三千万”的全权交给了钱工，并在第二天指挥部的会上明确宣布：这次审查预算，钱工为主，他为辅，钱工说话是算数的。

钱工成了焦点。众目睽睽，人们都注视着预算专家，而这位预算专家却只是和大家客客气气地点头寒暄，对任何预算问题都含含糊糊地回避，仿佛他丝毫都不管事！

“怎么办？”和丁猛一起来审查“三千万”的轻工局基建处处长着急地问。丁猛皱着眉，没说话，他在思索。

人们不知道：钱工正陷入尖锐、剧烈的矛盾中。晚上，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对着一桌子摊开的几十本“综合预算书”和计算尺、计算机，他紧锁着眉头，一个劲地抽闷烟，把自己埋在腾腾的烟雾中。他在“预算书”中一发现问题，就气得猛地举起拳头，……然而每次又无力地落下，叹息地摇摇头。丁猛几次推门进来，发现钱工内心矛盾的举止，钱工都连忙掩饰地支吾：“噢，没什么。”他能对丁猛说什么呢？对于这个被十几年动荡生活弄得不知所措，灭了锐气磨了棱角的工程师，丁局长从一开始就给了他以极大的温暖和信任——那是他曾经很熟悉，但十几年来又生疏了的感觉——使他心中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力量的冲击。当他看到丁猛，一个局长，提着饭盒给他打饭回来，点点头给他放下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一个预算人员的重大职责。但是，他却又想到妻子——一个理解丈夫事业的家庭妇女——在自己临来前说的话：“到维尼纶厂少管事，让领导作主，要不，更回不了北京了！”妻子的话，包含了他们几年来的苦恼

和艰辛的体会。为了调回北京，回原单位，把大半辈子的专业经验贡献出来，老两口几年来历经奔波之苦。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弄得他们满腹牢骚，个别承办人员的违法乱纪更气得他们发抖！前不久，总算熬到了国家建委来了调令，但是到了省里、局里，又几个月杳无音讯。现在，丁局长又叫他来维尼纶厂审查预算。他刚一听到还挺兴奋，他对本行工作有抑制不住的热情。可听到妻子一顿数落，他明白了：干开了，更脱不了身！……他内心的矛盾，由于张安邦的影响而更加激烈。他来维尼纶厂的第二天，儿子小博就来告诉他：张安邦的妻子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他答应帮助钱工解决调动的问题。钱工一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真要谢谢人家了！”没想到，却遭到儿子的白眼：“谢什么！你只要把‘三千万’批了就行了！”为了解除他的疑虑，儿子又说，“人家当然不会这样直接说。张书记说，你想专业对口，发挥专长，是人人应该帮忙的事情！还说，这两天我不用上班了，专门照顾你；有时间，多和你谈谈；说维尼纶厂要早日竣工，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还不是那个意思？”张安邦的网又把钱工网住了。

整整三天过去了，钱工毫无动静。

张安邦在各种场合更加轻松坦然，谈笑风生。

指挥部的成员们纷纷说，“三千万”该批了吧！

轻工局基建处的处长、副处长一天比一天焦急。

然而，丁猛这边却悄无声息。

谁也不知道丁猛在等待什么。可是在丁猛眼里，情况